

汉语方言指示词的语义图研究

薛宏武 闫梦月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汉语方言指示词是一种具有异类多义性的多功能语素,可用语义图模型予以解释。方言指示词共有“基本指示”“定指”“篇章直指”等19种语义或功能,其异类多义性表现为兼属多个句法范畴,同时伴有合音、轻读、声调合并的语音弱化现象。个体量词兼做定冠词、不定冠词等语法标记是“指(一)+量”结构成分脱落造成的无语义联系的同形现象。结构助词“之”“底”“者”是同属“指示”范畴的多功能指示词,“底”是“之”的语音弱化形式,“者”是“之”的另一字形。

关键词:多功能指示词;方言;语义图;成分脱落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2-0069-13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209

一、引言

现有研究显示,汉语方言的指示代词和量词存在一系列有同源关系的多功能现象,刘丹青(2002)、王健与顾劲松(2006)、陈玉洁(2007)、刘探宙与石定栩(2012)、李小军(2016)等学者都曾论及此类现象。刘丹青先生提出指示词发达型的北方方言与量词发达型南方方言的区分^[1]。王健、顾劲松进一步认为,涟水南禄话是兼有这两类用法方言的最北端^[2]。历时方面,刘丹青(2008)^[3]、陈玉洁(2011)^[4]认为“指示代词/量词>定语标记(结构助词)”的演变必需经历“定指标记(冠词)”阶段。本文通过对77种汉语方言材料的考察发现,刘、陈对指示词演变轨迹的论断符合汉语实际,但指示词发达型与量词发达型方言存在南北分野的论断却不符事实,例如隶属北方方言的西宁话(王双成2015)^[5]和烟台话(刘探宙、石定栩2012)^[6]量词都能兼表指示、定指,因此,涟水南禄话也不是这类兼用现象的最北端。事实上,除了表指示、定指、定语标记外,方言指示代词、量词及其变体形式,还有处所指示、时间指示、程度/方式指示、人称代词、类指、篇章直指、转指标记、状语标记、状态词后缀、话题标记、焦点标记、持续体标记、系词、句末语气词共19种语义和功能,句法范畴分属代词、助词、连词、语气词、动词、词缀多个类别,是一种典型的异类多义性语素。吴福祥先生(2011)认为:“异类多义性语素”是指一个特定形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而相关的意义或功能,这些意义或功能历史上来自相同的语源成分,但在共时层

收稿日期:2020-09-10

作者简介:薛宏武(1970—),男,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

闫梦月(1979—),女,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

面属于不同的形态-句法范畴或者关联不同的形态句法环境^[7]。可以用语义图模型理论予以描写和解释。从跨语言角度看,多功能指示词也非汉语特有,Diessel(1999)基于86种语言材料指出,指示词是定冠词、关系代词、第三人称代词、系词、句子联结词、方向动词前附缀等的共同语法化来源,并将其区分为指示副词(demonstrative adverbs)、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 pronouns)、指示形容词(demonstrative adjectives)、指示确认词(demonstrative identifiers)四个句法范畴^[8]。上述情况都表明,指示词的多功能性是跨方言、语言存在的普遍语法现象,是语义图理论的适用研究对象。

本文将基于对多种汉语方言指示词用法的描写,构建“指示”范畴概念空间,绘制若干方言点指示词的语义图,揭示方言指示词的语音、句法和语义特点,指示词与等价量词形式语义纠葛的成因,以历时概念空间解释中古、近代汉语结构助词“底”“者”与上古指示代词“之”的关系。本文所及的方言材料有:吴语区的绍兴柯桥、海盐、上海、苏州、杭州、温州、崇明;江淮官话区的安陆、涟水南禄、英山;徽语区的绩溪;赣语区的安义、吴城、黎川、抚州、泰和、大冶;客家话的揭西河婆、清流、梅县、浙江畲话;湘语区的益阳、泸溪、长沙、衡阳、双峰、江永、娄底;粤语区的广州、香港、四邑、东莞、雷州半岛、高州、化州;兰银官话的西宁、兰州、乌鲁木齐;闽语区的罗源、福州、汕头;中原官话的渑池、西安、商水、镇原、洪洞、永寿、晋城、耀县、渭南、固原、隆德、庆阳、凤翔、宝鸡、户县、陇县、绛县、静宁;北京官话的北京;晋语区的内蒙丰镇、临猗、河南安阳、获嘉、文水交城、长治、离石、汾阳、河北武安、平顺、兴县、山阴;胶辽官话的牟平、烟台、栖霞;西南官话的长阳;系属未定的桂阳土话。

二、方言指示词的语义与分布

(一) 方言指示词的语义

本文考察77种方言材料发现,方言指示词(量词)共有19种语义和功能。

1. 处所指示词

处所指示词是用来指示、区分空间处所远近的一组指示词,通常由基本指示词和处所义语素构成,所有方言都有这类指示词。例如:

(1) 安陆(盛银花 2007)^[9]: 喲儿蛮宽成,砌三间屋还有多的(这儿很宽敞,盖三间房子还有多余的)。

(2) 渑池(栗晓南 2019)^[10]: 这儿是小王家,兀儿是小李家,那坨儿是李杨家。

(3) 绍兴柯桥(盛益民 2014)^[11]: 益头是天津,亨头是北京(这儿是天津,那儿是北京)。

(4) 牟平(《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下文简称《大词典》): 坐儿乜场儿就不动了。

2. 时间指示词

时间指示词是用于指示、区分时间远近的一组指示词,通常由基本指示词与时间义语素构成,所有方言都有这类指示词。例如:

(5) 安阳(王芳 2015)^[12]: 那会儿,老师还上的课嘞。

(6) 罗源(黄涛 2016)^[13]: 只喂马上考书了(现阶段马上就要考试了)。

(7) 西宁(《大词典》): 奈早乎儿有个老奶奶,养给了三个儿子。

3. 程度/方式/性状指示词

这类指示词用于描摹某种属性、状态或动作的程度、方式,所有方言都有这类指示词。例如:

(8) 广州(《大词典》): 有咁快,得咁快(能多快,就多快)。| 佢噉话(他这样说)。

(9) 长阳(宗丽 2012)^[14]: 这懋大的萝卜我还没看到过。

像以前朱经理那懋搞,厂子肯定要搞垮。

(10) 桂阳土话(邓永红 2007)^[15]: 箇□[kɛ³³ŋ⁴⁵]远啊(这么远啊)。| 箇细话就明下(这样

说就明白些)。

4. 基本指示词

基本指示词是用于指代、区分人或事物的指示词,所有方言都有这类指示词。例如:

(11) 益阳(彭小球 周敏莉 2017)^[16]:咯是牡丹,哦是月季(这是牡丹,那是月季)。

(12) 揭西河婆话(张巧玲 2017)^[17]:列书袋哪倅个? | 里只书袋哪倅个?

(13) 安义(万波 1999)^[18]:个是我老弟(这是我弟弟)。| 许是渠俚个客(那是他家的客)。

5. 定指功能(定冠词)

部分方言的基本指示词衍生出了定指功能,用于标记其后的名词语是为听说双方所共知的某个确定的对象。例如:

(14) 北京(方梅 2002)^[19]:对,乌贼,乌贼,他们常吃[那东西]。

(15) 桂阳土话(邓永红 2007)^[15]:渠搞啖蛮多搞菜,[只桌子]啊摆满啖(他搞了很多菜,桌子都摆满了)。

(16) 广州(彭小川 2006)^[20]:[啲人]呢(那些人呢)? | [啲气氛]都几好㗎(气氛还蛮好的)。

(17) 益阳(夏俐萍 2013)^[21]:听哒讲[哦阿北京]例外个好耍(听说北京很好玩)。

[阿太阳]比[阿月亮]大啲好多(太阳比月亮大多了)。

例(14)“那东西”回指前句“乌贼”, (15)“只桌子”是前句“渠搞啖蛮多搞菜”的绑定信息, (16)的“啲人”“啲气氛”都是语境中已知的信息, (17)的“哦阿北京”“阿太阳”“阿月亮”都指向独一无二的事物。这四例中的指示词都标志已知、确定的对象,属于定指用法。

6. 类指功能

部分方言的定指义指示词,又衍生出了类指功能,用于标记其后的名词语为整类人或事物。例如:

(18) 北京(方梅 2002)^[19]:你知道吗,就[这外国人]呐,他们说话都跟感冒了似的,没四声。

(19) 罗源(黄涛 2016)^[13]:[嗜熊猫]都是食竹其(熊猫都是吃竹子的)。

(20) 泸溪(秦朗 2016)^[22]:[这蒲男的],只要有颗本事就长脾气了(这些男的,只要有一点本事就长脾气了)。

(21) 益阳(夏俐萍 2013)^[21]:[阿老师]都爱学生(老师都喜欢学生)。

7. 定语标记

在部分方言中,当定指结构“指+名”前又出现其他限定语时,指示词就重新分析为定语标记(结构助词),用于标记其前后词语间为限制(包括领属)或修饰关系。有的方言指示词还存在一种助指功能,即限定语与“指+名”结构为同位关系的情况。吕叔湘先生(1944)曾论及白话中“那”的助指用法:“‘助指’是说指称词要伴同其他加语才能产生指定的作用。”吕先生所谓“指称词”即指示词,“加语”即定语。由于指示词的助指用法总与其定指用法同形,且未见有其他表助指形式的方言(所有方言都用指示词表助指),因此,本文将定指、助指看作指示词的同一种功能。但比较而言,除以指示词做定语标记外,很多方言还有另一个通用的定语标记形式,如北京话“的”、澠池话“哩”[li⁵⁵]等。因此,定语标记仍应看作指示词的一种独立功能。例如:

(22) 北京(方梅 2002)^[19]: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把[我这头]磕出脑浆子来!

(23) 海盐(张薇 2012)^[23]:[伊个记性]越来越差,刚刚同伊讲过佚忘记脱哩(他那记性越来越差,刚和他讲过又忘记了)。

(24) 桂阳土话(邓永红 2007)^[15]:[你个女的]唔带起来咖(你的女儿不带过来呀)。

(25) 罗源(黄涛 2016)^[13]:[滨海者厝]做野俊(滨海的这些房子建得很漂亮)。

[厝吓电毯]具体使诺修年了(家里的那个电热毯用了几年了)?

(26) 益阳(夏俐萍 2013)^[21]: [她个/哦衣服]太多哒(她的衣服太多了)。

[泉伢唧阿单车]有看见哒(小泉的自行车不见了)。

8. 转指标记

部分方言的定语标记指示词,又虚化为转指标记,附在某个实词语前后,使其转而指向与该实词相关的某个人或事物,即名词化标记。例如:

(27) 绍兴柯桥(盛益民 2014)^[11]: [个弗去]是弗对啲(这不去是不对的)。

(28) 安义(万波 1999)^[18]: 我个本得一下是[新买个](我们的本子都是新买的)。

(29) 益阳(夏俐萍 2013)^[21]: [尔箇只/箇个/箇号/箇些/箇点(衣服)]太贵哒(你这衣服太贵了)。

例(27)的“个”前置于实词语“弗去”,例(28)的“个”与(29)的“箇只”等则后置于实词语“新买”“尔”。

9. 语气词 1

部分方言的转指标记指示词在句末又虚化为语气词 1,表肯定、确认的语气,其演变如普通话的句末语气词“的”。例如:

(30) 广州(《大词典》): 你都傻嘅。| 真嘅?

(31) 桂阳土话(邓永红 2007)^[15]: 渠唔得哄你搞(他不会骗你的)。

(32) 绍兴柯桥(盛益民 2014)^[11]: 是话阿兴上外定带啲,诺来驮得去(如果昨天阿兴预定着,那么你来拿走)。

10. 进行/持续体标记

部分方言谓语动词前后的介词结构“在+处所指示词”语法化为进行/持续体标记,例如:

(33) 安阳(王芳 2015)^[12]: 她在那儿写作业嘞。

(34) 桂阳土话(邓永红 2007)^[15]: 阿母在啲打衣裳,姐姐在啲煮饭(妈妈在缝衣服,姐姐在煮饭)。

台桌上放啲一碗水在啲(桌上放着一碗水)。

(35) 益阳(夏俐萍 2007)^[24]: 我在咯里搞饭吃(我正在做饭)。| 桶里装啲水在咯里(桶里装着水)。

11. 语气词 2

部分方言动词后的持续体标记“在+处所指示词”,在句末位置又虚化为语气词 2,表示肯定、确认的语气,有时以省略式“在”或“处所指示词”出现,语音上有所弱化。例如:

(36) 益阳(夏俐萍 2007)^[24]: 我吃啲饭在咯里,你不要忙了(我吃了饭呢,你不要忙了)。

(37) 安阳(王芳 2015)^[12]: 还剩两块钱嘞。

据王芳(2015)所述,安阳话的结构助词、语气词“嘞”是远指代词“那”的语音弱化形式。

12. 状语标记

部分方言的定语标记指示词类推进入“状+指+中”结构,用作状语标记。李小军(2016)从历时演变角度认为“个”的状语标记用法源于其定语标记用法。例如:

(38) 安阳(王芳 2015)^[12]: 慢慢儿嘞说,别慌。

(39) 广州(彭小川 2006)^[20]: 我哋粒声唔出嘞行(我们一声不吭地走着)。

13. 状态词缀

部分方言的状语标记指示词经常附于状貌义词语后,进一步虚化为状态词后缀。例如:

(40) 安阳(王芳 2015)^[12]:慢慢儿₁嘞 | 偷偷₁嘞 | 不停₁嘞 | 挨家挨户₁嘞

(41) 广州(《大词典》):买水₁嗽₁头(垂头丧气貌) | 禾熟₁嗽₁头(瞌睡貌)

14. 话题标记

部分方言指示词附于句子话题前后,形成了话题标记功能。例如:

(42) 北京(方梅 2002)^[19]:[这₁过日子]难免不铁勺碰锅沿儿。

(43) 揭西河婆话(张巧玲 2017)^[17]:[加₁做屋]啊,爱择正日来(就说那个建房子啊,要选好日子)。

(44) 浔池(栗晓南 2019)^[10]:[那₁读书],咋会有种地使晃,光摇摇笔杆就中了。

(45) 益阳(夏俐萍 2013)^[21]:[阿₁羊肉]我不爱吃(羊肉我不喜欢吃)。

(46) 罗源(黄涛 2016)^[13]:[我₁嗨]怀咯了,汝各依去就会使了(我的话就不去了,你们去就好了)。

15. 篇章直指

部分方言的句首指示词回指上文某句话,虚化为有句际联结作用的连词,即“篇章直指”(text deixis)功能的指示词。例如:

(47) 北京(方梅 2002)^[19]:要是闹出个人命来,那₁可不是闹着玩的。

(48) 揭西河婆话(张巧玲 2017)^[17]:甲:唔使上课了(不用上课了)。乙:加₁我下昼就转屋下(那我下午就回家)。

(49) 浔池(栗晓南 2019)^[10]:佢不坑气,那₁我也权当不知道。

(50) 罗源(黄涛 2016)^[13]:只蜀趴事计做过头嘞,嗨₁我就闲咯了(这一堆事情做完了以后,那么我就有空了)。

(51) 绍兴柯桥(盛益民 2014)^[11]:诺一个月趁三千,我也介₁话头(你一个月赚三千,我也这样)。

(52) 海盐(张薇 2012)^[23]:伊奈勿讲起,个₁我奴阿勿响哩(他没提起,于是我也就没说)。

伊奈刚刚中兹个奖,个₁勒伊开心来叫伊啊勿答应(他刚刚中了个奖,所以他开心得叫他也不答应)。

要兹猗卵伊奈真该好哩,个₁么奈啊贼再享伊一次机会算哩(要是他这次真改好了,那么你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算了)。

(53) 牟平(罗福腾 1992)^[25]:喝儿单单一斤烧酒,也₁还有个不醉儿(喝了将近一斤白酒,那还能不醉)?

16. 人称代词

部分方言的近远指代词基于“自我站位”的视角定位规律衍生出了三身代词的用法。闫亚平(2018)认为三身代词“自我站位”的视角区分是基于时空参照原点的视角定位形成的。Heinie & Kuteva(2002)和 Diessel(1999)也曾报导存在“指示代词>第三人称代词>代词附缀>动词一致性标记”的语法化路径。例如:

(54) 获嘉(《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你去吧,这₁儿们(我)不去了。

(55) 安阳(王芳 2015)^[12]:恁₁家(你家)离这儿远不远?

(56) 关中(唐正大 2005)^[26]:兀₁(他)是谁?兀₁(他)是我老师。

17. 系词

部分方言回指句首话题的指示词,在句中重新分析为系词,其演变轨迹与系词“是”的产生一致。例如:

(57) 罗源(黄涛 2016)^[13]:伊₁嗨先生,我是学生(他是老师,我是学生)。

(58) 益阳(夏俐萍 2013)^[21]: 我又不(是)阿细伢唧, 你紧箇跟哒我搞么子(我又不是小孩, 你老跟着我干吗)?

18. 焦点标记

部分方言的指示词有焦点标记功能, 该功能可由基本指示词或系词演变而来。“基本指示词>焦点标记”的演变路径可见于 Heine & Kuteva(2002)《世界语法化词库》; “基本指示词>系词>焦点标记”的演变如系词“是”到副词“是”的语法化。例如:

(59) 绍兴柯桥(盛益民 2014)^[11]: 渠介/实介个东西驮带过来(他拿过来了这样东西)。

19. 今天/今晚

“今天/今晚”等时间词可演变为近指代词, 如香港粤语的“今”演变为近指代词; “过去”义时间词可演变为远指代词, 如汉语史上“之”的演变。张定(2015)以汉语史及非洲乍得语材料论证了“‘往’义动词>过去的(时间)>远指代词”的语法化过程。方言中仅见前一类用法。例如:

(60) 香港(张双庆 1999)^[27]: 今期的六合彩开正我买嘅号码, 今匀发达冇(这一期的彩票开出我买的号码, 这一次发财了)。

张双庆(1999)认为香港粤语的近指代词“今”是从时间词语“今期”“今匀”等演变而来的。

(二) 方言指示词的语义分布

基于几十种方言指示词材料, 本文选取各大方言区的 18 个方言点, 将其指示词的语义、功能列表如下:

表 1 方言指示词语义分布矩阵

		基本指示	定指	定语标记	转指标记	语气词 1	类指	状态词缀	状语标记	程度/方式	时间	处所	持续体	语气词 2	篇章直指	话题标记	人称代词	系词	焦点标记	过去的
北京官话	北京	+	+	+	+		+			+	+	+			+	+				
吴词语	绍兴柯桥	+	+	+	+	+	+			+	+	+			+		+		+	
	海盐	+	+	+	+					+	+	+			+	+				
粤语	广州	+	+	+	+	+		+	+	+	+	+			+					
	香港	+								+	+	+								+
系属未定	桂阳土话	+	+	+	+	+				+	+	+	+				+			
湘方言	益阳	+	+	+	+		+			+	+	+	+	+		+				
	泸溪	+	+							+	+	+								
晋语	安阳	+	+	+	+			+	+	+	+	+	+	+		+	+			
	获嘉	+								+	+	+				+	+			
闽语	罗源	+	+	+			+			+	+	+			+	+		+		
中原官话	渑池	+	+	+						+	+	+			+	+				
江淮官话	安陆	+	+							+	+	+								
赣语	安义	+	+	+	+	+				+	+	+								
客家方言	揭西河婆话	+	+							+	+	+			+	+				
胶辽官话	牟平	+	+				+			+	+	+			+					
兰银官话	西宁	+	+							+	+	+				+				
西南官话	长阳	+	+				+			+	+	+								

三、“指示”范畴概念空间与方言语义图

(一)“指示”范畴概念空间

结合表1 方言指示词的语义分布,方言指示词的相关语法化研究及指示词的一般语法化规律,我们构拟了“指示”范畴的概念空间,共历时概念空间合并体现为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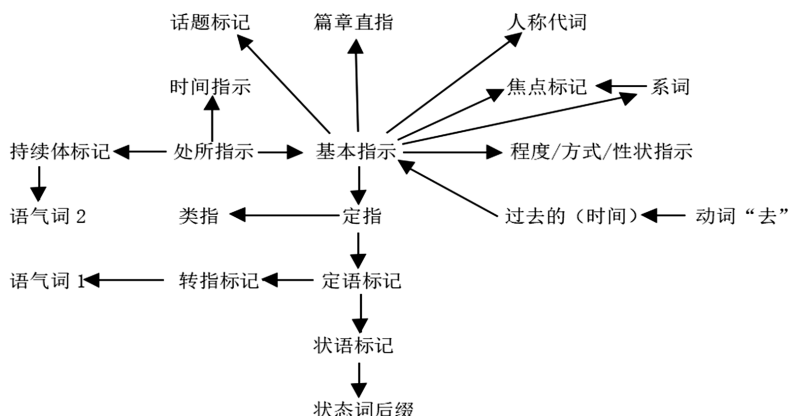


图1 “指示”范畴共历时概念空间

在确定节点位置和演化方向时,我们依据的是方言语义、功能的蕴涵关系。例如:第一类方言绍兴柯桥、广州、桂阳土话、安义的指示词有如下五种语义:基本指示、定指、定语标记、转指标记、语气词1;第二类北京、海盐、益阳、安阳话有前四种语义;第三类罗源和浣池话有前三种语义;第四类泸溪、安陆、揭西河婆、牟平、西宁、长阳仅有前两种语义。由此可推断这五种语义的蕴涵关系为:语气词1 $\supset$ 转指标记 $\supset$ 定语标记 $\supset$ 定指 $\supset$ 基本指示,因此这五个节点的排列位置与方向应为:基本指示 $\rightarrow$ 定指 $\rightarrow$ 定语标记 $\rightarrow$ 转指标记 $\rightarrow$ 语气词1,空间中其他节点位置与方向的确定可依此类推。在确定节点间的演化方向时,我们还参考了相关语法化研究成果与指示词的一般语法化规律,例如储泽祥、邓云华(2003)概括的指示代词近远指语义区分的蕴涵关系:“性状程度、动作方式 $>$ 时间 $>$ 人或物 $>$ 方所”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处所指示 $>$ 基本指示”“处所指示 $>$ 时间指示”“基本指示 $>$ 程度/方式指示”三种演化方向^[28]。又如北京话“这”的冠词化研究(方梅2002)^[19]、指示代词/量词 $>$ 定语标记(结构助词)的演变研究(陈玉洁2011)^[4]、量词“个”的语义演化研究(李小军2016)^[29]都能辅助印证节点间的演化方向。此外,《世界语法化词库》中列举的指示词相关语法化路径“往”义动词 $>$ 远指代词,这里/那里 $>$ 指示词,指示词 $>$ 定指,指示词 $>$ 关系化标记,这里 $>$ 关系化标记,指示词 $>$ 连词(篇章直指),指示词 $>$ 第三人称代词,指示词 $>$ 系词,系词 $>$ 焦点标记,指示词 $>$ 焦点标记,在…里(IN)/位于(LIE)/处所(LOCATIVE) $>$ 持续体,该路径对应于方言中“在+指示词/在/指示词”三种形式的持续体标记,后两种形式是第一种省略式。上述语法化路径都是本文参照的依据。

(二)方言量词多义现象的成因

综观各种汉语方言,承担上述指示词功能的词语可以是该方言的指示代词,如北京、安陆、获嘉、安阳、浣池、揭西河婆、罗源等,也可以兼用该方言的指示代词和量词,如广州、四邑、桂阳土话等。以桂阳土话为例,由指示代词[me³³]与量词[ko⁴⁵]及其变体形式“箇”[ke³³]“果”[kɔ⁴²]“搞”[kɔ⁴²]“咯”[ky⁴²]“咖”[ka⁴²]共同承担基本指示、定指、定语标记、语气词1等功能。从本文所及材料看,未见有无指示代词而由量词承担所有指示词功能的方言,因此我们推测,量词表指示是一种后起的兼用现象。对于量词兼表指示现象的原因,学界大体有四种观点:“脱落说”(Chao 1968,石汝杰、刘丹青1985,杨剑桥

1988,王健、顾劲松 2006,陈玉洁 2007,刘探宙、石定栩 2012,王健 2013,吴福祥 2018),“量词说”(曹广顺 1994,李小军 2016),“结构说”(石毓智 2002,赵日新 2003),“底层说(接触说)”(游汝杰 1982,步连增 2011)。本文赞同“脱落说”,即认为是“指+量”结构脱落指示词造成的量词兼表指示,依据是世界语言指示词语义演变的一般规律,指示词演变为定冠词、关系化标记(即定语标记)等可见于多种世界语言。据 Heine & Kuteva(2002)Diessel(1999)的研究所示,指示词虚化为定冠词是指示词语法化的普遍规律,该演变可见于多种语言。而“量词说”认为,个体量词能够直接演变为定指代词、不定冠词、定语标记,同时也是状语标记、名词化标记、语气词、基本指示代词、程度、方式代词、补语标记、话题标记、词缀等多种语法标记的共同来源,并将其语法化路径概括如下(李小军 201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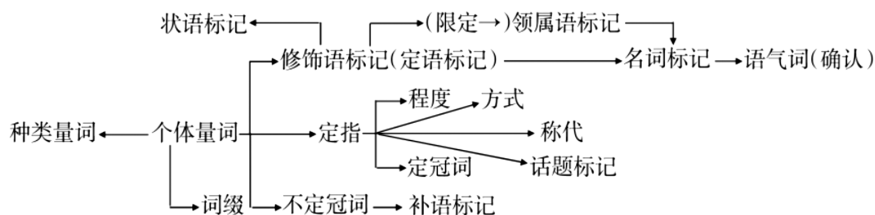


图 2

本文认为,个体量词不具备衍生上述多种语法标记的语义基础,图 2 中的演变在其他语言中也未见相关例证。“量词说”还会造成量词兼表定指和不定指两种相反语义的矛盾,如张谊生(2003)认为“个”存在“量词>不定冠词(不定指)>补语标记”的演变路径^[30],该不定指用法显然与“个”的定指用法矛盾。因此,我们认为量词兼表上述多种语义不是其自身演变的结果,而是主、宾语位置上“指/一+量”结构脱落指示代词或数词“一”造成的“删略生义”现象。吴福祥先生(2018)认为,删略导致特定成分(删略后剩余成分)获得一种“寄生”的意义,从而造成该成分的语义演变,其本身只是一种句法或话语操作,并非语义演变,但它是语义演变的一种诱因^[31]。此外,“结构说”和“底层说(接触说)”则是从指示词或量词自身的语义演变之外进行解释,没有直接说明量词兼表指示的语义成因。进而言之,“脱落说”可以合理解释某些方言中同形量词可以兼表数量、指示、无定三类无语义联系语法标记间的纠葛现象,如西宁话的“个”有表量,有定,无定及补语标记“的个”三类用法(王双成 2015)^[5],这三类成分显然并无语义联系和同源关系,成分脱落是解释这类现象的最好选择。量词兼做不定冠词和补语标记显然是在动词后宾语前,重新分析的结果,但语义上不属于“指示”范畴,本文不做讨论。此外,李小军(2016)认为“个”的不定冠词用法主要见于北方,定冠词用法主要见于南方;方言中罕见有种类量词“个”(即类指用法)的原因可能是从个体量词到种类量词的演变比较特殊,种类量词只能出现在其近远指用法后的原因也尚不明确^[29]。本文认为,“脱落说”与“指示”范畴概念空间可以合理解释上述三个问题:首先,“个”及其他量词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用法都可见于北方方言,甚至同一种方言,如上文所述的西宁话和烟台话。理论上,这种因成分脱落造成的语义演变应与方言的南北分野无关。其次,“个”的类指用法应该是从其定指功能演变来的,而其定指功能则是相邻指示词脱落的结果。对指示词而言,“定指>类指”的语义演变十分普遍,北京话“这”和英语的 the 都从其定冠词用法进一步衍生出了类指用法。再次,量词表类指出现在其表近远指(即基本指示)之后,也是由指示词“基本指示>定指>类指”的普遍语法化路径决定的。汉语量词的多义现象表明,同形多义现象的成因较为复杂,并不限于有语义衍生关系的多功能语素,成分脱落造成的删略生义也是其成因之一,因此,以语义图模型描写、解释同形多义现象应剔除无同源关系的多义形式。

(三) 指示词方言语义图及其异类多义性表现

基于上文构拟的概念空间,我们绘制了 13 个方言点的指示词语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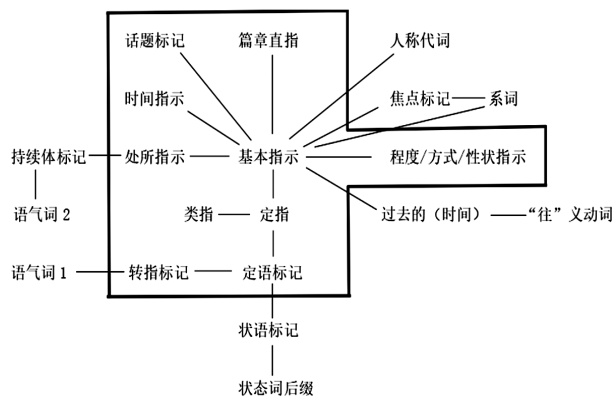


图 3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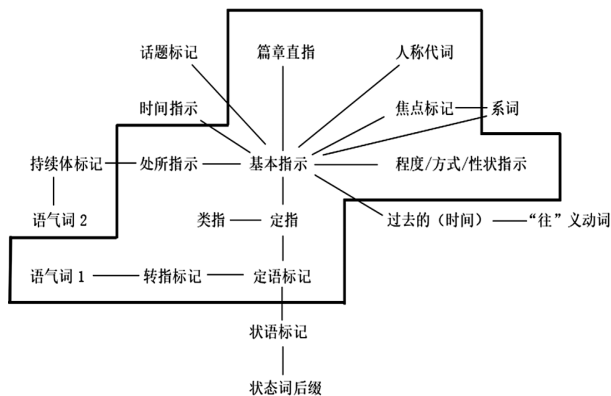


图 4 绍兴柯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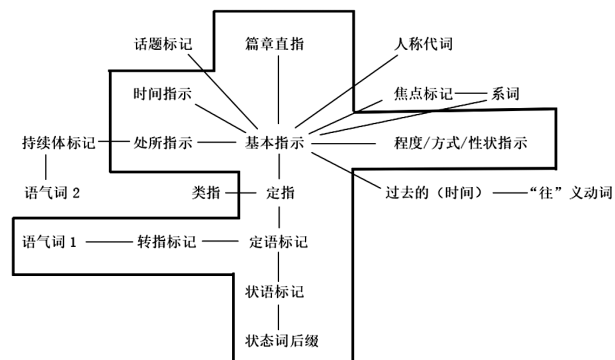


图 5 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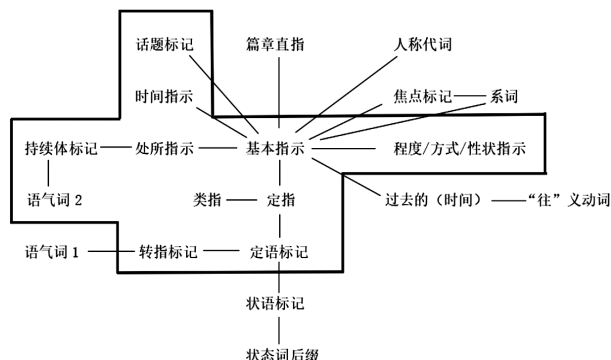


图 6 益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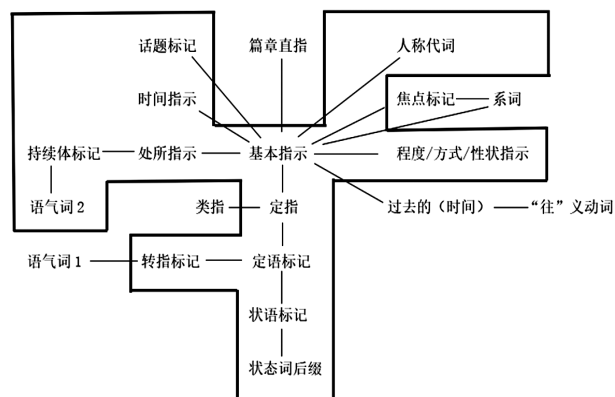


图 7 安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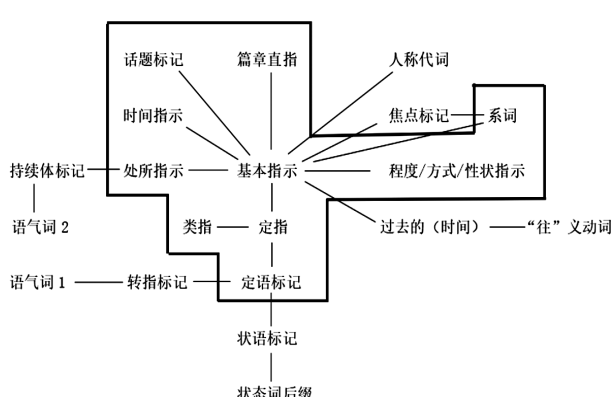


图 8 罗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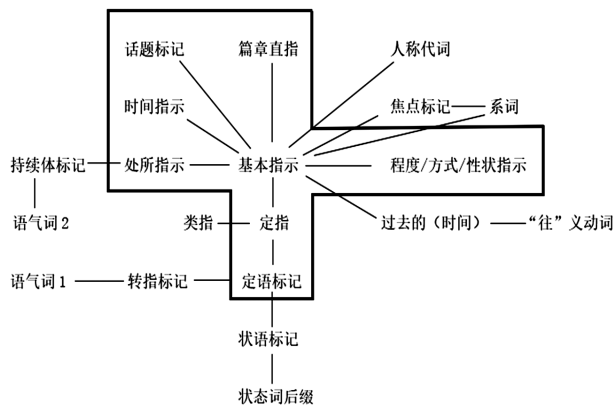


图 9 浞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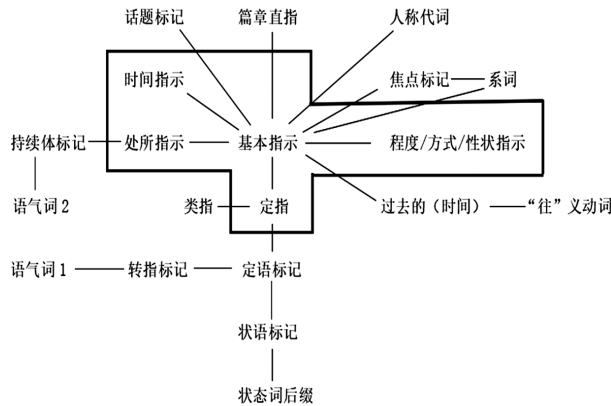


图 10 安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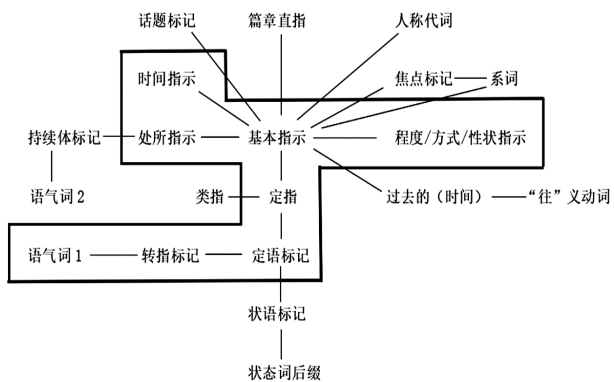


图 11 安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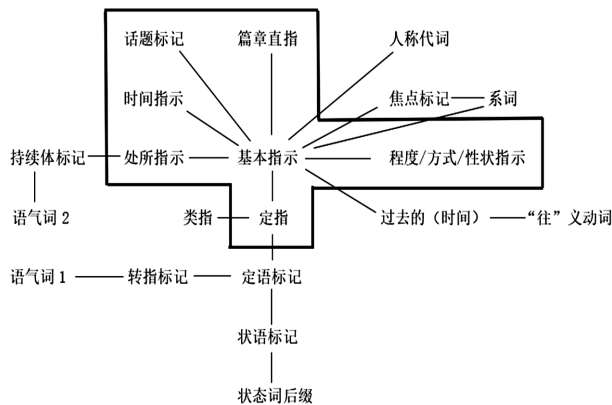


图 12 揭西河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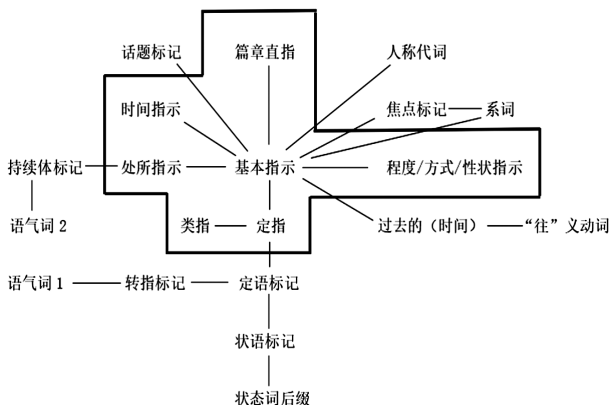


图 13 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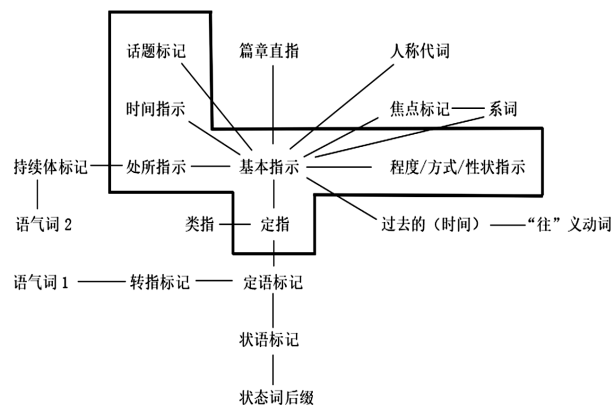


图 14 西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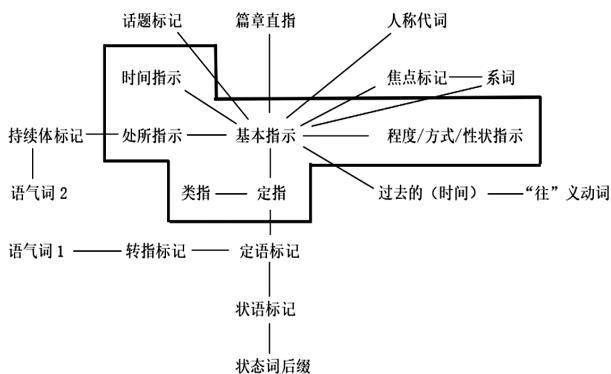


图 15 长阳

由表 1 和图 3-15 可知,基本指示、处所指示、时间指示、程度/方式/性状指示四种语义是所有方言指示词的共有功能,各方言指示词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其余 15 种功能上。从跨语言角度看,汉语指示词与世界其他语言也有诸多共性,Diessel(1999)述及的指示词的四个句法范畴,在汉语方言中都存在。基本指示、人称代词,能够独立做主宾语,用于指称人或事物,对应于 Diessel(1999)所谓的“指示代词”;定指、类指指示词,用于修饰、限制名词,标明其语义或信息上的特点,对应于“指示形容词”;处所指示、时间指示、程度/方式/性状指示,大多做状语,用于限定、描述谓语发生的时间、地点或其程度、方式,对应于“指示副词”;系词、篇章直指、话题标记、焦点标记,用于确认本句或上文某句的命题,标示、强调话题或焦点信息,对应于“指示确认词”。从语法化来源看,表具体概念的处所指示、动词“去”“过去的(时间)”都是指示词的语法化来源,类似演变也可见于其他语言。此外,状态词缀已虚化为词内语素,语法化程度最高。定语标记、转指标记、状语标记,持续体标记以及语气词 1、语气词 2,已分别虚化为结构助

词、动态助词和句末语气词,语法化程度较高,这可能与汉语虚词特别发达的特点有关。

句法范畴方面,汉语方言指示词兼属代词、助词、动词、连词、语气词、词缀多个语类范畴,是典型的异类多义性语素,而我们知道,在异类多义性语素的多个形式中,通常都存在语音弱化形式。据 Lichtenberk (1991):表达相关意义的形式可以不止一个,且其中必然存在语音弱化形式^[32]。伴随着指示词概念义的褪色与句法范畴的脱实向虚,很多方言指示词都衍生出了语音弱化的变体形式,具体表现为轻读、合音或声调合并现象。指示词轻读的方言如北京话,“这”的定冠词用法轻读(方梅 2002)^[19];指示词合音的如湖北大冶话,持续体标记“在里”合音为一个音节[·ts'ai](汪国胜 1999)^[33];指示词声调合并的如绍兴话,定指义量词的声调中性化(neutralization),即盛益民、陶寰、金春华(2013)所谓的“量名 A 式”(相当于“冠词+名词”),单音节量词调值合并为□^{33(?)},双音节量词调值合并为□^{33(?)—33(?)}^[34]。

四、结构助词“底”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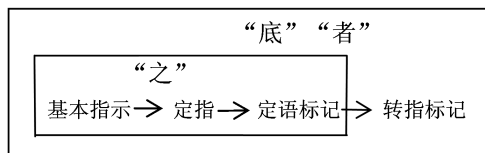
指示词的语义图研究,不仅能解释共时层面方言指示词的共性与差异,还能为近代汉语结构助词“底”的来源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对“底”的来源问题,学界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源于“者”(吕叔湘 1943^[35],曹广顺 1986^[36],冯春田 1990^[37]);二、源于“之”(王力 1958^[38],梅祖麟 1988^[39]);三、源于指示代词或方位词“底”(冯春田 1990^[37],石毓智、李讷 1998^[40],江蓝生 1999^[41])。第一种观点立足于“者”“底”功能的诸多相通之处,第二种观点立足于“之”“底”语音演变的合理性,第三种观点则是基于相关助词“个”来源于指示代词“个”的旁证。我们将现有研究中“之”“底”“者”的功能列举如下:

“之”:基本指示——定指——定语标记

“底”:基本指示——定指——定语标记——转指标记

“者”(遮、這、这):基本指示——定指——定语标记——转指标记

从其功能看,“之”“底”“者”都是属于“指示”范畴概念空间的多功能指示词,它们语义图表现如下:



由于“者”“底”与“之”同为指示词,并且其功能正好体现了“基本指示—定指—定语标记”到“基本指示—定指—定语标记—转指标记”的功能扩展,因此,根据多功能语素语义演变的一般规律,“者”“底”的来源应该是上古的指示代词或结构助词“之”。同时,“底”相对于“之”,语音也趋于弱化,从王力先生(tʃə→ti)^[38]和梅祖麟(tjəg→tjəi→tjɛi→tɛi→tei)^[39]对“之”到“底”音变构拟看,其语音都呈弱化趋势。王力先生(1980)认为,“者”是六朝后“之”的另一字形,“之”“者”同属照母,六朝后“之”的口语音跟文言“者”混同,因此借“者”字表示^[38]。而实际上,吕叔湘先生(1943)^[35]、唐钺(1926)^[42]都发现,“之”“者”在上古用法就已相混(吕叔湘:“另一个可能是在底字未出现时,之已侵入者的范围,或者者已侵入之的范围。这很可以表示者字久已有兼并之字的趋势。直到宋人的语体文字中,仍有这种例子。”),“者”用作定语标记的用例如:

(61)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庄子·应帝王》唐钺 1926 例)

(62)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吕叔湘 1943 例)

例(62)括号内原为同位结构(梅祖麟将“定殷者”分析为同位性定语)，“者”的定语标记功能正是

从上文所述的助指用法演变而来的。“底”“者”的出现大抵与其转指标记功能的出现同时。另外,汉语史上的指示代词“阿堵”“阿底(的)”“兀底(的)”“底”的来源应该也都是上古的“之”,其语义差异可能是近远指与定指的区别:“阿堵”“阿底(的)”为近指,“兀底(的)”为远指,“底”为定指。“之”“底”“阿堵”等兼属或分属指示代词或结构助词的现象也是指示词异类多义性的表现。现代方言指示词异类多义性的表现如广州话,定指代词“个”与结构助词“嘅”(定语标记)的来源都是指示词(彭小川2006)^[20]。

[参 考 文 献]

- [1] 刘丹青.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J]. 中国语文, 2002 (5).
- [2] 王健, 顾劲松. 涟水(南禄)话量词的特殊用法[J]. 中国语文, 2006 (3).
- [3] 刘丹青.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J]. 中国语文, 2008 (1).
- [4] 陈玉洁. 中性指示词与中指指示词[J]. 方言, 2011 (2).
- [5] 王双成. 西宁方言量词“个”的特殊用法[J]. 中国语文, 2015 (5).
- [6] 刘探宙, 石定栩. 烟台话中不带指示词或数词的量词结构[J]. 中国语文, 2012 (1).
- [7] 吴福祥. 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J]. 语言研究, 2011 (1).
- [8] Diessel, Holger.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9] 盛银花. 安陆方言语法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 [10] 栗晓南. 澠池方言指示代词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11] 盛益民. 吴语绍兴柯桥话参考语法[D]. 南开大学, 2014.
- [12] 王芳. 安阳方言语法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13] 黄涛. 闽东罗源方言描写语法[D].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 [14] 宗丽. 长阳方言语法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 [15] 邓永红. 桂阳土话语法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 [16] 彭小球, 周敏莉. 益阳方言的指示代词[J]. 绥化学院学报, 2017 (5).
- [17] 张巧玲. 揭西(河婆)客家话的指示系统研究[D]. 浙江大学, 2017.
- [18] 万波. 赣语安义方言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G]//李如龙, 张双庆. 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 第四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 1999.
- [19] 方梅.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 2002 (4).
- [20] 彭小川. 广州话含复数量意义的结构助词“啲”[J]. 方言, 2006 (2).
- [21] 夏俐萍. 益阳方言“阿”的多功能用法探析[J]. 中国语文, 2013 (1).
- [22] 秦朗. 湖南泸溪(浦市)方言代词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 [23] 张薇. 海盐话的指示代词研究[D]. 浙江大学, 2012.
- [24] 夏俐萍. 益阳方言“在咯里、在哦里”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2007 (1).
- [25] 罗福腾. 牟平方言的几种常见句式[J]. 方言, 1992 (2).
- [26] 唐正大. 关中方言第三人称指称形式的类型学研究[J]. 方言, 2005 (2).
- [27] 张双庆. 香港粤语的代词[G]//李如龙, 张双庆. 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 代词.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 1999.
- [28] 储泽祥, 邓云华. 指示代词的类型和共性[J]. 当代语言学, 2003 (4).
- [29] 李小军. 汉语量词“个”的语义演化模式[J]. 语言科学, 2016 (2).
- [30] 张谊生. 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J]. 当代语言学, 2003 (3).
- [31] 吴福祥. 词义感染与删略生义,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座讲稿, 2018.
- [32] Lichtenberk, Frantisek. Semantic change and heterosemy in grammaticalization[J]. *Language* 67.3, 475-509, 1991.
- [33] 汪国胜. 湖北方言的“在”和“在里”[J]. 方言, 1999 (2).

- [34] 盛益民,陶寰,金春华. 准冠词型“量名”结构和准指示词型“量名”结构——从吴语绍兴方言看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两种类型[G]// 语言学论丛.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35] 吕叔湘. 论“底”“地”之辩及“底”字的由来[M]//吕叔湘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1990.
- [36] 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J]. 中国语文, 1986 (3).
- [37] 冯春田. 试论结构助词“底(的)”的一些问题[J]. 中国语文, 1990 (6).
- [38]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1980.
- [39] 梅祖麟. 词尾“底”“的”的来源[M] //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40] 石毓智,李讷. 汉语发展史上结构助词的兴替——论“的”的语法化历程[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6).
- [41] 江蓝生. 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J]. 中国语文, 1999 (2).
- [42] 唐钺. 白话字音考源[M]//国故新探.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A Semantic Map Explanation of Demonstratives in Chinese Dialects

Xue Hongwu Yan Mengyu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demonstratives in Chinese dialects are a types of multifunctional morphemes which denote several of meaning or functions, such as deictic, definite, text deixis, etc. Their typological performances can be explained by demonstrative conceptual space and semantic maps. Chinese classifiers denoting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rticles simultaneously are a types of isomorphism caused by deletions of the demonstrative or “one” in constructions “demonstrative/one + classifier”. The demonstratives in dialects are of several different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are accompanied by phonetic weakening, such as synaeresis, schwa or intonation neutralization. The structural particle “dǐ” is the phonetic weakening form of demonstrative “zhī” in ancient Chinese, and particle “zhě” is another grapheme of “zhī”, they are all demonstratives and are of the same source.

Keywords: multifunctional demonstratives; dialects; semantic maps; deletion

[责任编辑:陈忻]